

仿天风阁丛书

似波词

小令

南乡子

送别

送客江船孤帆点点没天是都上高楼临别浦日暮一

片帆

长上小令

清南王士禛阮亭撰

南渡词祇漫存

选

南渡词祇漫存

南渡词祇漫存

夏承焘题

王士禛

撰



天风阁丛书

夏承焘主编

新波词

〔清〕王士禛撰

李少雍编校

广东人民出版社

装帧设计 曹辛之

责任编辑 梁鉴江

天风阁丛书

衍 波 词

夏承焘主编

李少雍 校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印张 2插页 155,000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400册

书号10111·1466 定价1.85元

内 容 介 绍

本书为夏承焘先生主编的《天风阁丛书》之一，辑清代著名词人王士禛词，逐一校勘。

本书以孙默编康熙间留松阁刻本《国朝名家诗余》为底本，参校康熙间刻本《阮亭诗余略》、康熙间刻本《红桥倡和词》、曾王孙、最先编康熙中金阊绿荫堂刻本《衍波词》、道光间苏雨亭辑素纸抄本《衍波词录》、赵之谦辑光绪六年刻本《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许迈孙编光绪十五年刊《榆园丛刻》、光绪二十七年吴氏石莲庵刻本《山左人词》、《四库备要·集部总集·十五家词》、民国二十五年铅印本《清名家词》等版本，并在王士禛词集之外，从《居易录》卷一、卷二、卷二十一及《百名家词抄》辑得词四首，编入《补遗》。

本书除有专文论述王士禛的生平思想及其词的成就和地位外，还辑录了有关王士禛的传记、序录、评论和年谱等，附于书末，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

序

词起于乐语，妙重声情。分饗诗坛，蔚为大国。昉自隋唐之滥觞，五代之蕃衍，花实递荣，遂极盛于两宋。元明以降，势渐陵夷。而入清复振，号为中兴。千三百年间，才人辈出，佳作如林。其持性情，系人文，资美育而可借鉴者甚巨。如何整理、发扬此项珍贵遗产，以适应文化高潮之勃兴，赞酖迪薰，使之成为文苑百花中耀目之一丛，则有待于吾人之努力。

顾词学之研究，向较冷落；词籍之整理，尤多阙如。明季毛晋以后，丛刻渐兴，读者称便。诸如《宋六十家词》、《四印斋所刻词》、《灵鹫阁刻词》、《双照楼影刊宋元本词》、《强村丛书》，号称五大丛刻。搜采既广，辨审多精，至今赖之。然皆限自宋元，毋及后世。近人陈乃乾先生始倡为《清名家词》，叶遐庵先生复编辑《全清词钞》，筚路蓝缕，厥功甚伟。然或成书匆遽，校勘略疏；或囿于体制，存词

过少。治词学者，尚有嫌焉。

二

有清一代，词学昌隆，流派间出，争妍竞奇，蔚成壮观；而论词之作，亦复层见迭出；中人既深，影响亦巨。且时代相承，去今未远，波澜消息，曲曲相通。鉴古酌今，尤有意义。

承焘近年养疴北上，卜居京门。鬓丝病榻之畔，药灶茶烟之旁，时有二三友好，风雨过从，议论纵横，而所及无非词者。因思裒集清人词籍，稍加理董，试为《四印斋所刻词》、《强村丛书》之继。乃不揣浅陋，与周笃文、冯统一、吴无闻诸同志粗定凡例，并约请诸词友择别善本，分题校雠。以词家传略、前人序跋、评介，辑附于后，以为知人论世之助，而名之曰《天风阁丛书》云。承焘年耄，体力日衰，其间纰漏谬误，定必不少。甚盼并世通人，有以锡正。

夏承焘序于天风阁，时年八十有三。

天风阁丛书凡例

一近世词家丛刻，如毛晋《宋六十家词》、王鹏运《四印斋所刻词》、江标《灵鹫阁刻词》、吴昌绶《双照楼影刊宋元本词》、朱孝臧《强村丛书》诸大名刻，皆止于宋元，而不及明清两代。是编之选，拟补苴阙略，搜集有清以来重要词家之词集予以整理，为治词者提供一较周备之校本。

一本丛书由夏承焘主编，并约请有关专家、学者和专业工作者分题担任校理工作。

一择别善本、足本为底本。

一凡有价值、有影响之版本，尤其是作者生前稿本、手定本和门人、后人校订本，以及同时代较有影响之选本，一律入校。

一有关词之标点，大体依据《词律》。叶韵处用『。』号；句用『，』号；逗用『、』号。个别词中，斟酌文意，间亦采用『；』号；『？』号；『！』号。

一有关校勘工作，逐字校下，凡与底本有出入处，均记于校文，以存各本之真。校文位置于每首词之后。

一凡底本所无，以其他校本补入之词作及存疑词等，列于集后，并于词后注明出处。

一底本中有缺字，用『□』号标出，存底本之真，以他本校字列于校文。

一每集前，有作者、作品介绍及简评文字。集后，有校读记。

一凡正史本传、集评、本事、年谱及有关论述资料，附录集后。

吴无闻执笔

衍波词总目

王士禛和《衍波词》	李少雍(一)
图版	(二四)
衍波词校勘	(三一)
附录一 传记	(一一一)
附录二 序录	(一四三)
附录三 集评	(一五一)
附录四 年谱	(一八五)
校读记	(二四〇)

王士禛和《衍波词》

李少雍

一

王士禛（一六三四——一七一—），字子真，一字貽上，号阮亭，别号渔洋山人，济南新城（今山东桓台县）人。死后，因避清世宗胤禛（雍正）讳，追改名为「士正」。乾隆时，诏命再改为「士禛」，这就是今天人们所熟悉的名字。

士禛原籍青州诸（今山东诸城）人。始祖王贵元末避兵乱，才迁居新城。王贵本是某「大姓」的雇工，二世祖王伍也没作过官，三世祖王麟只作了颍川王府教授这样的小官。而从他的高祖重光开始，到曾祖之垣、祖象晋，三代都考中进士，成为官宦世家。他的祖父崇禎十年致仕家居。顺治元年，诏令各地选拔人才，在明朝「数困场屋」的匡庐公（士禛父，名与敕）受到有司荐举，一下有了进身的机会。可是士禛的父亲却以奉养老亲为由，「廷对后，不谒选人径归」（《自撰年谱》），本节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于此）。这实际上表明了他的祖父和父亲拒绝为刚刚建立的清王朝效力的不合作态度。

崇禎七年，士禛出生在他的祖父河南按察使的官舍。所以小名叫「豫孙」。第二年，祖父调任

浙江右布政使，王士禛又随他到了杭州。七岁入小学。肄业之暇，就偷偷拿出唐诗来诵读。八岁便学会了做诗。他不仅自幼喜诗，而且对于诗有一种近乎「天赋」的领悟能力。据说他六七岁进乡塾时，「受诗，诵至《燕燕》、《绿衣》等篇，便觉帐触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士禛幼有「圣童」之称。有一次，他的祖父叫孙子们对句，刚念出「醉爱羲之迹」，他即刻便以「闲吟白也诗」一句相对。十五岁，成《落笈堂初稿》诗一卷，其长兄士禄序而刻之。十八岁中举，二十二岁成进士。二十四岁，游济南明湖，作《秋柳诗》四首，一时和之者数十人。这些诗很快流传四方，应和者更多，据说共有好几百人。诗人从此崭露头角，名噪于大江南北。

顺治十六年，二十六岁，授扬州推官。当时，扬州历年积欠「钦脏」二万余两。前任为了考成及格，大肆逮捕，严刑逼索。「本犯已故，辄禁其孥，甚者株连亲族。囹圄填溢。山人初至，见鸠形鹄面，银铛荷械，大半株连。惻然遣之曰：『视尔辈皮骨仅存，徒事桁杨何益？自今与尔辈约，吾为尔募代输，不复逮比公庭。其济，则尔诸人之福也；否则，吾以一官殉之。』」皆稽首谢去。于是为手疏，自巡盐御史、转运史、扬州道府以下各县为饮助，其十属州县以案之有无多寡为差。「他以推官身分出面募款，大小官员都割俸代输。不足，又向商人募捐。还是不够，便央求巡抚，具疏请豁免。于是，扬州积欠一清。扬州为南北咽喉，舟车毕集，事务烦剧。一般人都苦于应接不暇，而他却从容对付，游刃有余。「公左右裁答，酬应若流。侍史十余人，手腕告脱。尝以数月完钦件

数千。一时酢指，推为神奇。」（《年谱》引冒辟疆语）对于那些过往的「贵人」，他只是「一谒」而已，别无所进。当他不情愿地在牒诉倥偬中过完了白天以后，夜里便邀集名士们游赏佳胜，酒酣赋诗，在自己的世界里寻求慰藉和欢乐。吴伟业曾说：「贻上是广陵，昼了公事，夜接词人。」就是指这种情景。这时，他还得到另一诗界前辈钱谦益的赏识。二十八岁，编《神韵集》。三十岁，作《论诗绝句》四十首。他的神韵之说至此已告形成，「诗学已蔚然成一家」（郑方坤：《国朝名家诗抄小传》卷二）。

康熙三年，三十一岁，内迁礼部主客司主事。次年进京。十一年，奉命主持四川乡试。此次四川之行，诗人眼界大开，诗风也为之一变。每逢佳山胜水，「舟车专发，或至或不至，凡登、望皆有诗」。这些诗，骨力苍劲，高古雄放，与入蜀前所作颇不相同。

十七年，被召至懋勤殿赋诗，受到康熙皇帝的赏识。特谕：「王士正诗文兼优，著以翰林官用。」于是，改官侍讲学士。此后十余年里，曾先后奉命祭告南海及西岳西镇江渚，有机会一览南海诸胜，重游秦蜀名山。其视野因之更加扩大，其诗作也因得江山之助而「生色有加」（《年谱》引阮亭《与盛符升书》）。十九年，迁国子监祭酒。当时太学生很多。在考试中，他「力持公道，公卿纨绔请托不得行」。三十一年，调户部右侍郎。在户部，他对种种行贿受贿的弊规深恶痛绝，并竭力加以禁革。如他掌管钱币制造时，一上任就罢除了给主管官员送「样钱」的陋例。赈济饥民时，

有个所谓「入粟」的旧例，他「预戒所司，不得以一呈一稿至前」。在户部七年，持身洁白，皦然泥而不滓。

三十八年，迁刑部尚书。「山人官司寇，矜慎庶狱，力从宽大。于秋审、朝审，尤不敢唯阿臧默。因以改正全活者甚众。」他体恤冤民，尽力保全，而于为恶、诬告者，则又必致之法。其时京城有个叫徐起龙的居民，其女出嫁后不久，就被婆母曹氏引来辛二、僧宣召（此二人与曹氏私通）逼奸。徐起龙得知后，便与其表弟侯六登曹氏之门责问，发生了冲突。刑部有关官员反以起龙兄弟白昼抄抢，草草结案。他亲自察访，发现起龙兄弟在押，非常气愤，碎其牍掷地。「洁满汉司官：『汝曹畏势乎？徇情乎？抑纳贿乎？如此爰书，乃敢诬我，天地神明其可欺乎？』立令释二人银铛，系曹氏、辛二之颈。而令严提宣召到案。」徐起龙一案得到公正了结，「都人皆以为快」。

四十三年，以失出（重罪轻断）罢官。他立即登车就道，无一毫恋栈之意。返家后，闭门著书，淡泊自守，「不以一字通朝贵」，直到康熙五十年病逝。

从王士禛一生行事中，可以看到他思想性格上的一些特点。

士禛以推官起家，以刑部尚书致仕，要之与刑官相终始。他刚上扬州任，就接手治理所谓「海寇」一案。先是有一名宦专治此事，株连收捕了很多入。士禛接办后，全力保全善类，果断平反冤狱，止息了「告讐」者的气焰。此后数十年里，他曾为许许多多的人平反，减等，改缓。他最后罢

官，也是直接由「失出」的原因引起的。他在司农、祭酒等任上，始终秉公持正，洁身自励。在户部时，他在公余颇究心于《内典》。他曾对人说：「少无宦情，又口不习言阿堵物。虽日在钱谷簿堆中，不啻空山雨雪、烧品字柴、说无生活时也。」（《年谱》引《答淄川唐济武书》）这的确是他淡泊、清廉的素性的写照。官祭酒时，公正取士，「苞苴干牍，皆不得行」。他自己尽管身居九列，也「从不于人以私，子弟应试，虽门生、故旧，未尝以一言囑也」（宋莘撰《阮亭王公墓志铭》）。

他这种恤民慎刑、廉洁正直的思想性格的形成，固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而家庭教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士禎生于他祖父的官邸。他四岁时，祖父致仕家居，「亲教诸孙」。中乡试后，已经九十多岁的老人特地把珍藏名画送给少年得意的小孙子。他在祖父身边生活了整整二十年。他祖父「为人宽厚」，「平生喜淡泊，室无媵侍」，常常告诫子孙「勿矜门第，务力学为善」。而这些所谓「宽厚」、「淡泊」、「为善」的言传身教，对士禎幼小心灵的影响自然是很深刻的。慈惠的母亲孙夫人对他的影响也不小。他去扬州赴任时，母亲为他送行，对他「少年为法吏」很担心，要他象他的祖先们那样宽厚待人，克尽职守。两年后，孙夫人也到了扬州。当时因为「失出」而降职罢官的人不少。这位夫人却对儿子说：「人命至重，汝但存心公恕，升沉非所计也。」这是何等的襟怀！后来士禎的次子官唐山令，他训诫儿子要「洁己爱民」，并「书手镜录一册付之」，同孙夫人之训子如出一辙。

在家庭教育的影响下，士禎自少即无「宦情」（官瘾），对「阿堵物」（金钱）也不感兴趣。他的兴趣，可以说是在书中，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他在扬州任上，「五年不名一钱，急装时，唯图书数十篋」。入京作官后，「三十年俸钱所入，悉以购书」。罢官离京时，行装只有「图书数篋而已」。据说他作刑部尚书时，某个读书人几次想拜见他都没见到。有人对这个求见者说，每月十五日，到慈仁寺书摊去等候，一定能见到他。后来果然达到了目的。这时，他已是年近古稀的老人，嗜书的癖好仍未衰减。士禎不仅嗜书成癖，而且还有山水之癖。他自己曾说：「予自少癖好山水。尝忆古人身到处莫放过之言，故在扬州日，于金陵、京口、梁溪、姑苏诸名胜，皆于簿书期会中不废登临。而公事亦无濡滞者。吴梅村伟业师谓予在广陵，『日了公事，夜接词人』，以拟刘穆之。予岂敢望古人？若山水之癖，则庶几近之耳。」他在到扬州前，就游览了山东许多名胜。入仕后，除扬州及其附近地区外，他因使节所经，「遍历秦、晋、洛、蜀、楚、粤、吴、越之乡」（郑方坤撰《国朝名家诗抄小传》卷二），所至凡遇佳胜，必舟车专往，登临赏鉴。王丹麓《今世说》云：「阮亭为同考（校者按：指初至扬州充乡试同考官），至白门，夜鼓柁行大江中。漏下将尽，始抵燕子矶。王兴发欲登。会天雨新霁，林木萧飒，江涛喷涌，与山谷相应答。从者顾视色动。王径呼束苴以往，题数诗于石壁，从容屣步而还。」（《年谱》引）第二年，因事往吴郡。归途中，「舟泊枫桥，过寒山寺，夜已曛黑，风雨杂遝，山人摄衣著屐，列炬登岸，径上寺门题诗二绝而去，一时以

为狂」。他对于山水名胜之爱，确实已近于如痴如狂的程度。直到他罢官归里后，还以七十二岁的高龄，游赏漪园及大明湖诸胜，兴致似乎不减当年。

他何以对书、对山水如此酷嗜呢？除个人爱好外，在一定程度上与诗人对当时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现实的态度也很有关系。诗人初入仕途，那一片敲扑喧嚣之声使他震惊；在大司农任上，贿赂公行的现实使他厌恶；在刑部，徇私枉法、草菅人命的情形使他愤慨。他对于权贵们及谄媚阿谀之徒也很反感。有一次，某内大臣祝寿，有大僚手持「金笈」，请诗人赋诗「侑觞」。他说：「曲笔以媚权贵，君子不为。」便坚决拒绝了，表现了他清廉正直的高尚品德。现实使他厌倦，他便爱书恋旧；社会使他失望，他于是转而留连山水。他把书和大自然作为自己的天地、自己的世界，并在其中求得快慰和解脱。

二

王士禛是清初最有影响的大诗人。他晚年自己编订《带经堂集》九十二卷，其中收诗四千余首。此外，他还有《渔洋诗话》、《蜀道驿程记》、《池北偶谈》、《居易录》等著作。他的诗论，以「神韵」为宗，在当时影响极大。神韵一说，不特为他的诗作所实践，而且同《衍波词》的关系也不小，因而有必要对此说略加阐述。

神韵之说，源出严羽。明代前后七子谈诗，也标举此说。他们先后受到公安、竟陵等派的抨击，到明清之际，其气焰几乎烟销灰灭。唯一能存其遗风者，就是李攀龙的同乡、王士禛的叔祖季木先生。而士禛的诗论即深受他叔祖的影响。钱谦益说：「季木歿三十余年，从孙贻上复以诗名鹊起，闽人林古度论次其集，推季木为先河，谓家学门风渊源有自。」（《有学集》卷十七）诗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其诗及诗论的确都是渊源有自的。

但是，他以自己深厚的修养和才力，远远越出了季木先生的樊篱。他的诗论不仅有家学渊源，而且在一定意义上是适应当时的诗及诗论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开国之初，人皆厌明代王、李之肤廓，钟、谭之纤仄，于是谈诗者竞尚宋、元。既而宋诗质直，流为有韵之语录；元诗缛艳，流为对句之小词。士正等以模山范水之才，倡天下『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之说。天下翕然应之。」（《文献征存录》卷二）诗坛为救明末诗风之弊，已经试探了各种新的路径，却都难差强人意。士禛的神韵说一出，便使当世耳目一新。他提出此说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以大音希声，药淫哇锢习」（俞兆晟《渔洋诗话序》）的作用。

诗人自己不曾有专论对其神韵说作过明确的阐述，他的有关观点散见于各种著作中。所谓「神」，大体上说的是情趣微妙而超诣；所谓「韵」，说的是意味含蓄而深长。而这种情趣和意味，通常是由描写山水景物的诗传达出来的。因此他的宗盛唐，侧重于宗王、孟，比较强调冲和淡